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

按经济规律办事 推动企业形成新优势



现在,大家都在说新常态。何为“新常态”?简单地说,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

中国前几年经济的增长是超高速增长,这种超高速增长并不符合经济规律。所谓新常态,就是要在把经济增速,拉回到服务经济规律的速度上来。对此,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中高速增长即可。即使经济增速定在7%左右,在全球来看,也是位于增速前列。事实上,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高,但是不可能长期这么高,因为这种超高速增长,给经济带来的害处很大。大体上有五个不利,第一是资源过度消耗;第二是生态环境破坏;第三是低效;第四是有些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第五是错过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日本都抓紧时间技术创新,以便给经济找出一条新的途径。中国也应该如此,若此时中国为了追求超高速增长忽略了这一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将会是重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新常态要追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主要有三个表现:其一,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即不会出现产能过剩和浪费资源的现象。其二,由技术创新驱动而非数量型的扩张。最后,与改善民生息息相关,经济增长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断有预测指出,2015年企业生存更为艰难。《中国企业报》记者问我是否认同,企业该如何渡过难关?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充分认识到。从国际环境来看,西方经济仍处于恢复通道期,国际环境依旧不乐观。而国内处于结构调整阶段,部分产业要压缩,并把创新驱动放在第一位。面对国内外的环境,企业也将面临诸多困难,而这种

压力不会比2014年更小,但关键是要有信心。我们要对改革充满信心。目前破解难题,都要通过改革来实现,错过改革时机后果十分严重。

那么,信心从何处来?我们有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而这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源自何处?我认为在民间。老百姓的愿望就是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而企业要从此处获得鼓舞。对于企业而言,要有三个观念的转变。第一,过去总以为扩大规模,进行数量扩张就是好的,现在来看绝非如此。第二,企业要选择适合自身企业发展的方向。盲目投资是不可取的,要进行有效投资。明确企业规划,并根据消费走向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第三,在进出口方面,既要重视出口,更要增加进口。少买进口商品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观念,当时我们缺少外汇。而今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新常态下,各国都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从而达到进出口贸易的基本平衡。

对于解决企业融资难题,第一,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随着证券市场中,主板、创业板、中小板、三板的陆续推出,给无论大小企业,都提供了融资场所。这样的话,企业要注重自身质量的提高,比如财务报表不能掺水,企业透明化,而这也是未来注册制改革需要强化的内容。其二,对于小微企业而言,需要解决生存问题,初期的话,减税比贷款更有效。只有生存下来,才有立场谈发展。第三,小微金融需要进一步发力,包括民营银行的建立等。2015年,加快上述改革的步伐,企业信心将会逐步增强。

在谈到改革和调整时,民企和国企在经济新常态下的调整各有侧重。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有三个层面需要调整。首先是管理体制上的转型:家族制、家长制管理体制已经过时,应该采取经理人制度。血缘关系不一定等同于接班的关系,儿子可以有股权,但如果他的才能不足,就不能成为公司将来的总带队,亟待建立产权清晰的法人治理结构,而这更符合现在企业的需要。第二,进行改革,我在江西上饶考察的时候就看到,有几个民企通过职工持股制度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同时,民企高层实行股权激励制度,而这也是民企自身灵活性才能得以实现的。第三,在产权得到保护、产权清晰的基础上,民企要重视发展方式的转型,进行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关注市场变化,研究市场动向,以此为基础进行生产,产品才能有好的销路。其中,诚信为本更是题中要义。

对于国企而言,第一要对市场进行调研,产品市场体量有多大要有清晰的定位,产品的生产计划是否符合实际。第二就是走混合所有制的道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把资本盘活,目前来看,几万亿国有资本不能灵活运用,国企生产效率并没有提高,我认为应该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最后,厉以宁说:“希望中国企业发展论坛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并且能够作为一个示范,让所有的民营、国营企业都能够新的创新道路上借鉴。”

(本报记者王莹采访整理)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其文:

新常态下,创新者更有作为

我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并结合我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分析,对中国经济发展轨迹做了一个概括性比较。总体认为,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快速发展,难能可贵,但谋划未来要讲究科学推进。

中国一段时期以来的高速增长,如果连续多年超过5%,那么这个周期能持续多长?中国的发展从二战以后的1946年开始,进入1981年,中国经济增长开始连续超过5%,这期间当然有的年份不止超过5%,到横为止有34年超过5%的增长。再横向比较,日本是25年,终点是七十年代。新加坡29年,其他的国家都在二十几年这个发展阶段。在大的经济体当中,中国所持续的时间,是历史没有的。

所以厉以宁院长说道,这个新常态经济增速是由经济规律决定。再从增长值来说,这次达沃斯说,现在的7%比原先的10%都高。去年的增量历史上几乎是最高,所以关于新常态,粗看起来让人有点悲观,好日子好像过去了,实际上经济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按照美元汇率,中国的GDP有一组数据。主要体现在1990年、2002年和2014年。1990年的时候,按照美元计算的中国的GDP是美国的13%,中国就是13厘米的一棵小苗,到2002年日本长高了一点,中国仍然还不到1米呢,到了2014年,日本1.5米,中国是3.34米。1990年的时候,日本相当于一个1米的小孩看一

个13厘米的婴儿,到2014年相当于一个1米多的小孩看到姚明,只不过位置对换了,中国成为高个子了。所以新常态应该看到中国的发展积累了优势。

有关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有三个指数。第一个就是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很有名啊,中国2001年-2013年的名次一直是三十左右,和中国的GDP世界第二不大符合。第二个就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这个很有名,多年来对世界竞争力做排名,300多项指标,我列举的是2000年开始的竞争力。当时中国大陆没有让人觉得特别高兴的排名,这与创新不足有关。

还有一个指数是全球创新指数,中国排名第一是效率指数,但是整体来说34位,创新指数还是差在这儿,中国香港排名第八,新加坡排第三。这三个指数都对创新提出了要求,相比之下,我们的创新很不足。

除了指数分析,再就是世界企业500强的企业演进。2013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有95家企业,美国曾经有200来家企业,第二个就是日本,日本有超过150个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而中国呢,从刚开始的十来个企业,到现在百来个企业。

另外一个就是专利技术的申请,这就是PCT专利申请,通过PCT申请国际专利,可以加快申请速度。据统计,美国现在每年将近6万了,破纪录了,日本有4万多,据此判断,这两个国家之所以发展快,创新是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经济发展,从区域上分析,也呈现不同的特点。

通过对各省经济发展的数据比

较,PCT专利贡献最大的是广东。

2013年以来,世界申请专利按企业来算,松下第一,中兴第二,第三华为。中国两家企业居前三名,而且2007年开始,第一名就被这三个企业轮流垄断了,华为曾经得过第一,中兴得过第一,松下也得过第一。为什么广东研发这么厉害,他们好几千项。

再值得比较的就是高校所体现出来的实力。在中国北大和清华无疑是代表。在美国,加州很厉害,加利福尼亚大学排第一。北大在2012年进入前十,清华是第17名,但是2013年这两个学校都后退了一点。

我们在国内做专利申请很投入,每年中国的专利局接受的申请最多,从专利申请总数中看,异军突起的就是江苏。在前些年,广东表现特别突出。山东作为江苏的邻省,也应有有所作为。山东最后一年是第四,山东的特点是稳重。在发明专利上,山东按照总量是第五,发明专利的申请也是第五。

我之所以拿专利说事,因为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那就是咱们的经济发展总量是举世无双的,咱们在创新能力上,确实还有一些差距。所以,中国的企业同行,应向华为、中兴学习,也向国外的先进企业学习,依靠创新驱动,才能打出一片新天地。

在此,我想特别说明,前几年有一个消息,中国的新能源很厉害,申请专利占世界申请的80%多,涉及三种新能源,但是发展到后来,我们只是在本土申请的多,在外面申请的少。中国三种能源在外面申请的比例只有2.3%、1.0%、0.6%。我当时想,这需要我们走出去,也需要国际化的人才。

我特别欣赏胡锦涛同志曾经在报告中总结的“二不”心态,既不自卑,也不妄自尊大。看到了问题,中国人不能丧失士气,但是也不能看不到问题,不要妄自尊大。

所以说,今天咱们相聚在这个会上,既需要国家领导人以及各地方领导的科学决策能力,又需要在座的企业家和人民的信心、勇气、智慧、创新精神和辛勤努力。新常态,给每一个创新者都准备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院中心研究员常修泽:

新常态下,企业机会来自四个方面



2014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创下1990年以来新低,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遇到了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新形势下,企业家除了要提高信心,还要踩准时点,寻找增长新空间。

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发展后,中国2015年经济发展基本态势,可以用“中高速”三个字概括,中国速度由高档调转至中高档。

经济增长减速,社会上有一种悲观情绪,但我认为不会爆发系统性风险。回看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募集250亿美金,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IPO事件。阿里巴巴之所以成功,是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顺应人类新的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那么阿里巴巴之后,我们认为,大数据时代、工业革命4.0的概念逐渐被认知,需要把人类的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崭新的经济浪潮,以及当下的经济发展现状结合起来。

新的商业模式开始被人们重视,比如有些投资者给云南古茶树做电子商标。普洱茶平均每公斤70元,但古茶树的茶叶平均每斤1万元到2万元。有人给古茶树安上摄像头,从采集、生产过程开始记录,将电子信息新技术与当今的生产经营结合起来,利用品牌效应进行营销。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创新意识。

如果说,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那么2015年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关键的一年。

2015年开局,中石化销售公司将29.99%的股权约1070亿资本向社会开放,这里面有很大的商机。类似的还有金融改革、财税改革、资源品价格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尤其是垄断性行业改革、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改革都在酝酿或推进中,与企业相关的改革决定一旦被国家认可和颁布,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将会到来。

2015年将调整三个方面的结构,即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如何在三个结构调整中瞄准商机至关重要。

需求结构中的三驾马车,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其中消费需求是重点,占49%(其中政府消费大概13%-14%,居民消费35%-36%左右),在全世界范围比例是较低的,发达国家一般是70%甚至更高,这意味着空间十分广阔,蕴含有很大机会。

针对产业结构调整,在资源品包括钢铁、铝、石油价格大幅下降背景下,产业的出路就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高端设备制造业等,像发展高铁,那么与此相关的零件的制造、车辆的制造就会被带动发展,还有就是信息化相关的产业门类。2014年第一次出现服务业增加值超过了工业和建筑业增加值的总和,达到47%左右。预计2015年服务业的比重还会继续上涨,达到48%-49%左右。用不了几年,服务业占全国生产总值会超过50%,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其中生产型的金融、物流、设计、研发、咨询、商业中介等产业,生活型的如大健康产业,都将有更多的机会,是未来的大的增长点。

在区域结构调整上,主要是瞄准“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全方位开放的、对外发展的大格局,每个企业要研究自己所在的区域,研究自己如何与“一带一路”搭建联系,以寻找更多机会。

(本报记者崔敬、郭凯采访整理)

